

论乾隆帝对马嘎尔尼使团态度的转变

张懿德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要: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政府以向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出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此举得到了乾隆帝的高度重视,并对英使团表现出欢迎的态度。但随着中方与英使团在觐见礼仪问题上的艰难交涉,乾隆帝对于不谙礼节的马嘎尔尼使团深为不满,而当乾隆帝了解到英使来华的真实目的后对马嘎尔尼使团态度则显得十分警惕,这种态度的转变体现出乾隆帝对马嘎尔尼使团认识的深化。不可否认,陈旧的外交思想确实导致以乾隆帝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缺乏对世界的了解,但从马嘎尔尼来华这一事件中乾隆帝的言行来看,他对外部世界也并非一无所知。

关键词:乾隆帝;马嘎尔尼使团;态度;转变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17)01-0081-05

DOI:10.13388/j.cnki.ysaj.2017.01.016

马嘎尔尼访华是中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派遣官方使团以向乾隆帝祝寿为名到达中国,希望与中国最高统治者进行谈判,以扩大中国市场,谋求商业利益。尽管马嘎尔尼出使中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其影响十分深远。中外学界对于马嘎尔尼使团来华的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但主要是对与该事件相联系的客观事实的研究和探讨,本文拟从乾隆帝对马嘎尔尼使团态度的转变这一新的视角,力求对这一事件的全貌有更为客观和清楚的认识。

一、诚心向化,龙颜大悦

马嘎尔尼使团一行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九月二十六日从英国朴茨茅斯港起航,在历经近一年航行后,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末到达中国境内。由于马嘎尔尼此次来华肩负着扩大英国在华商业权益的使命,尤其是面对着一个拥有巨大人口的广阔市场,所以英国政府和商界表现得尤其谨慎。英国政府在派马嘎尔尼出访时先经英商向两广总督署转交了一封公函,公函中表达了欲派马嘎尔

尼使团来华为乾隆帝祝寿的意愿。由于清廷陈旧的外交观念和落后的天朝上国思想,再加上时任署理两广总督郭世勋有欺君邀宠之嫌,将一封对等商谈的文书,译成了藩属国对宗主国的所谓“表文”。《掌故丛编》中收录了时任署理两广总督郭世勋上奏皇帝的译文两篇,其中一篇有这样一段:

“向有夷商来港贸易,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进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今我国王亲信大臣公选妥干贡使马嘎尔尼前来,带有贵重贡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惟愿大皇帝施恩远夷,准其永远同好……我国王感激不尽。”^{[1]614}

当时的英国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特使(马嘎尔尼)的信件、笔记和报告中充满了这类字眼”,^[2]所以一定不会以这样卑贱的口吻与中国进行文书往来。《掌故丛编》在此信之后又附重译书信一封,在此截选与上文大致相对应的一小段,以供参考。

“敝国君主大不列颠国王兼法兰西国王、爱尔兰国王佐治第三,声名远播及于寰宇。前闻中国皇

收稿日期:2016-11-23

作者简介:张懿德(1994-)男,河北张家口人,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帝八秩正寿 原冀其侨居广州之居民应派委员赴京祝嘏 乃嗣问祝嘏委员未克及时遣派良用歉仄 兹欲与中国皇帝发生友谊 并增进两国之邦交 扩充两国人民之商业。”^{[1]617-618}

郭世勋译出的“表文”交到乾隆帝案前时 乾隆帝对英国欲远涉重洋来华祝寿的行动自然十分高兴 满朝文武大臣也纷纷迎合奉承。署理两广总督郭世勋在上给乾隆皇帝奏折中说 “臣伏思前年恭遇皇上八旬万寿 中外胪欢 凡边塞夷王酋长骈集都下 真旷古未逢之盛事。今英吉利国王遣使涉历重洋 远道祝嘏 具见凡有血气 莫不尊亲。”^{[1]612}直隶总督梁肯堂也上奏乾隆帝 “臣仰见皇上德威远播 声教覃敷 似此海隅外夷人亦不避重洋 输诚入贡。当航海献瑞之时 正劲旅凯旋之候。熙朝圣事 亘古罕闻。”^{[3]282}大臣们的附和更是激发了当时已 82 岁高龄的乾隆帝极大的兴趣 老皇帝对此事极为重视 除安排沿海各省官员以及钦差征瑞、乔人杰、王文雄等官员负责接待工作外 还遣直隶总督梁肯堂会同料理。除此之外 乾隆帝还以“阅其情词 极为恭顺 恳挚 自应准其所请 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为由 破例批准马嘎尔尼使团“在天津进口赴京” 同时谕令沿海各督抚 “海洋风帆无定 或与闽浙、江苏、山东等近海口岸收泊亦为可知 该督抚等 如遇该国贡船到口 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 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 毋得稍有迟误。”^[4]

关于马嘎尔尼使团是否应向接待官员行叩头之礼的问题 早在使团到达天津之际 乾隆就对钦差大臣征瑞、直隶总督梁肯堂等有过关于此问题的指示: “若该贡使等于进谒时行叩见之礼 该督等故不必辞却。倘伊等不行此礼 亦只可顺其国俗 不必加之勉强。”^{[3]118}在使团到达天津后 马嘎尔尼与其副使斯当东要求以平行之礼见负责接待的长芦盐政征瑞 征瑞拒绝亲身前往 乾隆帝得知后告诫征瑞不应 “自居尊大 与远人斤斤计量”, “况该使臣航海远来至一年之久 始抵天津 亦当格外加之体恤”,^{[3]119}这足以体现乾隆帝对马嘎尔尼使团抱有欢迎的态度。

还有一件令乾隆帝龙颜大悦的事是征瑞在天津见过马嘎尔尼使团后上奏乾隆帝 “英吉利贡船舱内正中供奉圣容 外边装金镶嵌珠石 外罩大玻璃一块 该贡使十分敬肃 不敢在此起坐”^{[3]351}。而据副使斯当东在其日记中所载 “有些人(指中国人)进到‘狮子号’官舱 看见墙上挂着一张中国皇帝的画像 他们立刻伏在地上 非常恭敬的在地皮上几次亲吻。”^{[5]225}由此观之 马嘎尔尼使团船舱的确挂有乾

隆帝画像。乾隆帝对于“狮子号”船上供有自己的画像充满了好奇 通过军机处指示征瑞弄清画像的来源 “英吉利从未遣人入贡 何由瞻仰圣容 该贡使所供奉者或系如各省万寿牌相仿 征瑞差往之道 将等看待不真 误认为朕容亦未可定 否则必系从前西洋人郎世宁、艾启蒙曾恭绘圣容 传至该国。若云该国将金珠装嵌 欲以入贡 而贡单内并未载入 且亦无以御容进贡之理。征瑞是否亦曾目睹 若未经看见 或于无意中作为闲谈 相彼询问船中所供御容从何而得。如果伊国诚心供奉 亦足以见其敬事之忱 不妨令其据实登答 遇便覆奏。”^{[1]661-662}由乾隆帝的指示可以看出尽管乾隆皇帝还不了解马嘎尔尼所乘船上供奉“圣容”这一事件的全貌 但从字里行间都可以流露出乾隆帝的喜悦之情。

二、不谙礼节 深为不愜

清朝立国后继承并沿用了中国古代其他朝代的对外交往模式 即“封贡体制” 又称“朝贡体制”。由于该体制的本质属性是政治关系而非贸易关系 因此中国历代在对外交往中对于诸如觐见礼仪这样具有政治象征性特点的细节尤为重视 清代亦不例外。^[6]如上文所述 乾隆帝对于马嘎尔尼使团向接待官员行何种礼仪的问题上相当宽容 但那只是考虑到英使远涉重洋 诚心向化而对英使采取的怀柔之礼 乾隆帝重点关注的是英使向自己应行何种礼仪。^[7]随着征瑞和梁肯堂汇报接待英使的奏折如雪片般到达皇帝案前时 他从梁肯堂、征瑞奏折中一再读出英使不谙礼节的举动 因而对于马嘎尔尼使团的不满也越来越强烈。如梁肯堂在上奏乾隆帝的奏折中说 “臣等恭宣大皇帝有旨 该贵使向上免冠竦立”^{[3]360} 在之后的奏折中梁肯堂又说英使“免冠叩首”^{[3]364} 梁肯堂对英使所行礼仪含糊不明的表达使乾隆帝十分警惕 乾隆帝传谕征瑞和梁肯堂 “如该使臣于筵宴时实在叩首则已 如仍止免冠点首则当于无意闲谈时 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 到天朝进贡观光者 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 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如此委曲开导 该使臣到行在后自必敬谨遵奉天朝礼节方为妥善。”^{[3]129}由此可知 乾隆皇帝强调征瑞要以委曲开导之方式使马嘎尔尼在面见其本人时行跪拜之礼。在同一天的谕令中 乾隆帝令征瑞 “留心察看该贡使是否恭顺抑或不免稍露矜傲”, “据实具奏 以便到京酌量接待”^{[3]130}。同时 乾隆帝很快就以一道谕令将直隶总督梁肯堂调走 原因是总督职分较大 若与贡使偕赴热河,

“贡使以天朝多派大员照料,益足以长其矜傲。”^{[3]362}由此推断,乾隆帝认为使团不谙礼节而且十分“矜傲”,于是用宽严相济之法,一方面令大臣耐心开导,一方面调离直隶总督以削其傲气,这体现出乾隆帝对使团的不满开始愈加显现出来。

最令乾隆帝不满的还应该是中英双方关于觐见礼仪的交涉。征瑞、乔人杰、王文雄等人在经过与马嘎尔尼的两次关于觐见礼仪的交涉后几乎毫无成果,马嘎尔尼不仅态度坚决而且以将开具说帖向钦差大臣解释为由进行拖延。^[8]在此期间,征瑞向皇帝撒谎,欺骗乾隆帝说在他的开导下,英使深以不娴天朝礼节为愧,连日学习,渐能跪叩,并向乾隆帝奏明到热河后英使还要继续学习,“跪拜娴熟,方可带领瞻觐。”^{[3]374}征瑞此举其实并不难理解,由于乾隆帝对使团不谙礼节的不满使征瑞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若将马嘎尔尼的态度如实报告必然会引起皇帝的愤怒,也会使自己受到牵连,征瑞只能寄希望于英使在此问题上的妥协。然而,一直到热河,双方对于觐见礼仪的交涉仍在继续,一直到万寿节前夕才最终确定。无论最后商议的结果如何,这一期间乾隆帝对于马嘎尔尼使团的不满确是十分的明显。乾隆帝在上谕中说“此次英吉利国使臣到京,原欲照乾隆十八年之例,令其瞻仰景胜,观看伎剧,并因其航海来朝,道路较远,欲比上次更加恩视。今该使臣到热河后迁延装病,观望许久,不知礼节。昨令军机大臣传见来使,该正使捏病不到,上令副使前来,并呈出一纸,语涉无知。当经和坤等当面驳斥,词严义正,深得大臣之体。现今令演习仪节,尚在托病迁延。似此妄自尊矜,朕意深为不愜,已令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万寿节过后,即令该使节回京”。^{[3]148}这一上谕可以明显感到乾隆帝对于英使团已经相当不满,此上谕发出的直接影响则是“使节团的伙食标准大大降低”^{[5]402}。尽管之后又发出上谕一封“今该使臣经军机大臣传谕训戒,颇知悔惧。本日正副使前来先行谒见军机大臣,礼节极为恭顺。伊等航海远来,因初到天朝,未谙体制,不得不稍加裁抑。今既诚心效顺,一遵天朝法度,自应仍加恩视,以遂其远道瞻觐之诚。”同时强调“该使臣祝庆先行回京时,王大臣等毋庸传见,仍令在馆舍住宿,所有京中各处前拟令其瞻仰处所及筵宴赏赉事,俱俟回銮后再行降旨遵行。”^{[3]149}该则上谕背后到底是马嘎尔尼向清廷妥协还是清廷故意发这样一封上谕造成英使团让步的假象以欺骗国人,目前依然不得而知,但是谕令后两句显示出乾隆

帝对使团不满的情绪。乾隆帝并没有更改在上一则谕令中所做出的万寿节后令使团回京的安排,同时在使团回京之前被禁止见任何王公大臣,到京之后也不可随意走动。这些举动实际上严格限制了使节团的人身自由,这可以看作乾隆帝对于使团不谙礼节的一种惩罚。

三、非分于求,留心警惕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十日,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马嘎尔尼使团,尽管中英双方关于使团觐见皇帝应行何种礼仪的交涉直到最后关头才达成一致,但整个仪式进行得十分顺利。不可否认,马嘎尔尼在宴会上行何种礼仪目前学术界对此仍有争议,但比礼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马嘎尔尼向乾隆帝递交了英王的书信,书信中的内容则是马嘎尔尼此次来华的主要目的。英国国王在给乾隆帝的信件中提出一系列要求,清人梁廷枏在其著作《夷氛闻记》中对此有特别精炼的记载“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英使觐高宗于万树园幄次,旋以要求诸款,向政府提议:请留一人居京师,理其贸易,使臣复诣内阁陈请,欲改由宁波、天津通市,并求给舟山小岛,与附近广东省城一小地段定居,其来商广州者,自城外下澳,及货由内河载运,求竟免税,或酌减而少之。”^[9]看到英使呈上来的信件后,“乾隆震怒”,“论以所请均属窒碍难行”,^[10]因此,乾隆帝在颁给英王的敕谕中对于英国的要求给予逐条驳斥,也正是英国的“非分于求”使乾隆帝认识到马嘎尔尼使团来华并非仅仅祝寿这么简单,相应的,乾隆帝对其态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对使团“不谙礼节”的不满和抱怨转变为对他们“非分于求”的警惕和防范。从此之后,对于英使团的防范和警惕成为了乾隆帝处理与英使团相关事宜的基本态度。

乾隆帝通过马嘎尔尼所递交的信件了解到英国人此次来华目的后,一方面通过和坤、征瑞、乔人杰、王文雄等督促英使离京回国,另一方面则指示负责护送的松筠以及所经省份的督抚等官员做好对英使团的防范和监视,不论是通过军机处所发的廷寄还是乾隆帝所发的谕令,乾隆帝对于英使团的防范和警惕体现得十分明显。从八月二十五日到八月三十日,乾隆帝频繁地作出指示,对马嘎尔尼离京回国途中的护送、供应以及对突发事件的处置都作了周密妥善的安排。关于沿途官员对于英使的护送和接待问题,乾隆帝于八月二十五日的廷寄中传谕沿途各督抚“将来该贡使等经过时,该督抚等祇须派令道

将护送,不必亲自接见,其水程应需供给及口食等项,俱照例应付。俾无缺乏,不可假以礼貌。”并强调“倘有藉词逗留等事,应飭令护送官员严词拒绝,催令按程前进,毋任迁延。”^{[1]747}在此之后,乾隆帝考虑到拒绝英国派人留京居住的请求可能会导致“该贡使因不遂所欲,与西洋各处夷商勾串齐心行,小有煽惑,不可不预为之防”,于是在八月二十七日的廷寄中指示新任两广总督长麟与广东巡抚郭世勋“随时留心,先事察看”,一旦有此迹象,应“安抚别国商人,不令与彼合为”。^{[1]749}在八月二十八日给长麟和郭世勋的廷寄中,乾隆帝再一次表达了其对于马嘎尔尼使团可能给清朝对外贸易带来威胁的忧虑,他认为“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今不准其留人在京,该国王奉到敕谕后不遂所欲,借词生事亦为可定”^{[1]750-751}。不仅如此,乾隆帝还担忧澳门地方的安危和稳定,由于英国船只大量在澳门停泊和贸易,因此有与澳门英商勾结寻衅滋事的可能,故令其二人密为留心察看。在此廷寄中乾隆帝还考虑到英使欲于广东回国可能会向来华贸易的各国夸大此次来华的成果,或“欲思从中抽分税银以为渔利之计”,或仗着英国在海上的强横,并“假天朝声势捏造御旨诓诱夷商”,^{[1]750-751}从而给清廷带来不便。基于此种考虑,乾隆帝令长麟到任后的首要任务既是会同郭世勋等向来华贸易的各国商人及使节澄清类似谣言,且严格禁止别国夷商与英使团往来,以避免相互勾结。^{[1]752-753}同时,乾隆帝令督抚等“飭各标营所有墩台、营汛及旗帜器械务宜鲜明整肃,俾该夷等见天朝兵威壮盛,不敢稍萌轻忽”^{[1]753}。乾隆帝在给沿途督抚的谕令中甚至明确指出“倘松筠等有稍需兵力弹压之处,即应听其檄调,俾资应用,若呼应不灵致有掣肘,为该督抚是问。”^{[3]398}

由于英王给乾隆帝信件中向清廷提出“欲于直隶天津、浙江宁波等处海口贸易,并恩赏给附近珠山小海岛一处及附近广东省城地方一处,居住夷商,收存货物。”此项条件被乾隆帝驳斥回绝,但乾隆帝依然考虑到今后这些地区的安危,发出谕令“海疆一带营汛,不特整饬军容,并宜豫筹防备,即如宁波之珠山等处海岛及附近岙门岛屿,皆当相度形势,先事图维,毋任英吉利夷人潜行占据。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驶,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著传谕各该督抚属认真巡

哨,严防海口,若该国将来有夷船驶至天津宁波等处妄称贸易,断不可令其登岸,即行驱逐出洋,倘竟抗违不遵,不妨慑以兵威使知畏惧。此外如山东庙岛地方,该使臣曾经停泊,福建台湾洋面,又系自浙至粤海道亦应一体防范。”^{[1]751}虽然这种将制海权拱手让与他人的防御思想完全错误,但是乾隆帝对于英国的警惕确实难能可贵。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帝对于英使团的防范与警惕不仅仅能从其频繁的谕令中体现出来,从之后马嘎尔尼与松筠和长麟的交流中也能窥探一二。松筠和长麟在与马嘎尔尼使团的交流中特别注意对马嘎尔尼做开导和劝慰,二人主要是以皇帝对于使团的正面评价或借用皇帝给予英使团的微小赏赐来安慰在北京碰壁的马嘎尔尼。长麟作为新任两广总督,他还以暂时削减进口税或允诺马嘎尔尼对若干贸易规则作出修改等方式达到此目的。如在使团到达广东后,长麟一一答复了马嘎尔尼提出的一些请求,并对一些请求给出了积极的信号,这使马嘎尔尼重拾对华贸易的信心。二位官员如此做法实际上是得到了乾隆帝的指示而有意为之,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十月,乾隆帝指示长麟“传知该使臣,以尔国王此次差尔航海远来,纾诚纳赋,大皇帝原深为嘉许,赏赉优加,嗣因尔等不谙中国体制,冒昧渎请,天朝定例素严,应准应驳,无不按例而行。尔等所请于例不合,是以未准。大皇帝并无嗔怪尔等之心,尔等不必害怕。”^[12]这一条史料就是乾隆帝指示长麟安抚马嘎尔尼的有力佐证。乾隆帝此举最终目的则是试探马嘎尔尼来华的意图,并力图以劝慰的方式来消除英国人对华的敌意,^[13]这也从侧面体现了对于马嘎尔尼使团的警惕。

总之,乾隆帝对于马嘎尔尼使团离京回国的安排可以说内容全面又细致入微,这些安排均体现出皇帝对于该使团的留心防范和高度警惕。

四、余论

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不仅是中英交往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还代表了中西方文明之间难得的一次交流与碰撞。众所周知,这次访华行动以失败告终,若究其原因,往往会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观念作祟,闭关锁国,统治阶层闭目塞听、愚昧无知。诚然,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所留下来的外交遗产——封贡体制确已不合时宜,严重阻碍着包括上层统治者在内的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步伐,但是如果说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对于外部世界的形势和

变化浑然不知,想来也并非合乎情理。实际上,乾隆帝作为一个较有作为的君主,对于世界的形势有一定的认识,如乾隆帝曾问传教士蒋友仁“所谓新西班牙、新法兰西、新荷兰是什么意思?”蒋友仁便向乾隆帝说是由于欧洲探险家们发现不知名且有很少土著人居住的土地后就派人留在土地上开发,建立殖民地,这些地方就以开发这里的国家名字来命名。^[14]正如吴伯娅在《乾隆对天主教的认知与对策》一文中所述“乾隆详细询问周边国家沦为殖民地的过程,探讨‘新西班牙’等地名的来历,表明他对席卷全球的殖民狂潮有所警觉,对国家安全不无忧虑。”^[15]同样的,马嘎尔尼来华正值清廷对廓尔喀用兵结束不久,乾隆帝曾降旨查问英吉利人是否曾与中廓之战有联系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16]这也许就不难理解福康安对马嘎尔尼使团的冷漠态度。再结合上文所提到的乾隆帝在安排马嘎尔尼离开中国时指示督抚整饬海防,说英国人在海上恣横,善于驾驶,以上种种皆可佐证。至于乾隆帝在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所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等语,不妨将其理解成为一种外交用语,而不宜将其作过度的解读。总之,马嘎尔尼来华对清朝来说是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清朝可能借此融入世界市场,同时也有被殖民的危险。面对机遇和挑战,乾隆帝更为看重的是稳妥的维护自身统治秩序。在此次事件中,以乾隆帝为代表的统治阶层虽谈不上高瞻远瞩,但也远非愚昧无知。

(参考文献)

[1]故宫博物院掌故部.掌故丛编[Z].北京:中华书局,1990.

- [2]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2.
-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嘎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G].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 [4]中华书局影印.清高宗实录:卷1421: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壬子条[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
- [5]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M].叶笃义,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
- [6]李云泉.再论清代朝贡体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97-98.
- [7]王戎笙.马嘎尔尼“谢恩信”和“跪拜如仪”质疑[J].明清论丛,2009(9):274.
- [8]马嘎尔尼.1793 乾隆英使觐见记[M].刘半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40-65.
- [9]梁廷枏.夷氛闻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7:4.
- [10]束世澄,邵循正.中英外交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10-11.
- [11]中华书局影印.清高宗实录:卷1436: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条[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6-197.
- [12]中华书局影印.清高宗实录:卷1439:乾隆五十八年十月戊子条[M].北京:中华书局,1985:233.
- [13]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99-212.
- [14]冯作民.清康乾两帝与天主教传教史[M].台北:光启出版社,1966:175-176.
- [15]吴伯娅.乾隆对天主教的认知与对策[J].清史论丛,2002:136.
- [16]戴逸,李文海.清通鉴:11册[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4689.

(责任编辑 王宇)

A Research of Qianlong's Changes of Attitudes towards the Macartney Embassy

ZHANG Yi-de

(College of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70)

Abstract: The Macartney Embassy was the first British diplomatic mission to China, which took place in 1793. Emperor Qianlong gave high concentrations on this mission, and extended his welcome to the Macartney Embassy initially. Then,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 negotiation about the ritual of the kowtow, the Qianlong Emperor was more and mo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embassy. What's more, when Macartney presented King George III's letter with Qianlong Emperor, the emperor was very alert to the Macartney Embassy and the British. Due to the traditional constraints, the governor were lack of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n the western culture, but, in this case, judged by the Qianlong Emperor's behavior, he has the certain acquaintance to the world.

Key words: Emperor Qianlong; Macartney Embassy; attitude; change